

みんなのポジトリ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云南刀耕火种地区的变迁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09-04-28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尹, 紹亭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15021/00002279

云南刀耕火种农业的变迁

尹 绍亭*

云南是中国刀耕火种农业分布最多的省分。刀耕火种农业直是云南一些山地民族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探求云南刀耕火种的地理分布,研究其区域差异及其演变过程,是民族学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 地理分布

云南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农业,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以50年代中期为界,此前为盛行期,此后为衰落期。从其分布来看,则主要是分布在从滇南到滇西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的边境环形地带。滇中、滇东和滇北,古代自然也有过刀耕火种的历史,然而由于开发较早,人口稠密,因此基本上绝迹了。在滇西南环形边境地带,其地貌大致可以分为高地和低地两类,高地主要是中低山地,低地是河谷坝子(盆地)。低地居住着傣族和汉族等民族,从事水田灌溉农业;高地居住着彝、独龙、怒傈僳、景颇、佤、布朗、拉诺、瑶、苗等民族,从事刀耕火种农业。50年代以后,山地民族兼营水田者越来越多,刀耕火种的面积已经大为减少,目前的分布示意如图。

滇西南刀耕火种的盛行和延续,有地理和人文两方面的原因。

滇西南刀耕火种带大部分地处南亚热带,如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南部、思茅地区南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临沧地区西南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少部分地处北亚热带,如怒江峡谷高地和独龙江峡谷。而不论地居南亚热带还是北亚热带,皆属海洋季风气候,滇西受控于印度洋西南季风,滇南受控于太平洋东南季风。海洋季风给该区带来充沛的雨量,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在1500毫米上下,西盟阿佤山区怒江峡谷北段和独龙江峡谷,年降雨量多达2500—300毫米。年降雨量虽多,但雨日多集中在5至10月,10月至翌年5月及少降雨,形成干湿两季分明的气候。这一气候特征,无疑是刀耕火种农业盛行的一个重要的自然条件。对于水田灌溉农业而言,干湿季的转换对其并无太大影响,而对于刀耕火种农业来说,就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了。众所周知,所谓刀耕火种,其特征之一是靠烧。在冬春之际的备耕时期,必须有持续的晴天,砍伐的树木才晒得干,烧得透,收成才有希望。该区5至10月的旱季满足了这一要求。刀耕火种的第二个特征是靠雨,4、5月种子入土之后,有雨则发芽生长,无雨则干涸枯死,而此时雨季正好来临了。由此看来,刀耕火种农业

* 云南民族博物馆

盛行于海洋季风气候地区，不是偶然的。

该区干湿两季分明，然而四季温度却并不显著。由于所居纬度较低，气候长年温暖，除怒江峡谷高地和独龙江峡谷之外，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在17—22℃之间。高湿多雨的气候，有利于山地季雨林和常绿阔叶林的生长繁殖。林地砍种一年后，地中残留的树桩已蓬勃发枝，7、8年又可恢复成森林，树木直径可达15厘米左右。尤其是该区山地具有不少速生树种，如水冬瓜树（*Alnus nepalensis*）、短命树

（*Tremaorientalis*）等，树苗生长3、4年，直径就可长到10厘米以上。水冬瓜树并且是及好的肥地植物，其根部的根瘤菌具有固氮作用，是更新地力的绿肥，因而不少山地民族皆人工种植水冬瓜树以进行粮林轮作。树木成长迅速，植被更新周期短，是刀耕火种盛行的第二个条件。

滇西南边境地带，解放前被称之为“瘴疠之区”，内地移民视为畏途，土著民族则人口稀少。刀耕火种是轮歇农业，人均占地面积远远多于水田农业。一般而言，人均有地必须达到30亩以上，这一农业生态系统才能保持良性循环。解放前该区刀耕火种极为盛行，主要是人少地多的缘故，解放后刀耕火种规模急剧缩小，其实是人口迅速增长的结果。

人们通常认为，云南刀耕火种的存在，是原始民族残余，这种看法显然忽视了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我们在对待异民族的文化时，应该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尤其不要忘记以“适应”去分析和把握问题的实质。

二 区域差异

滇西南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欲以“砍倒烧光”，“一把刀一把火”这类字眼进行概括，未免过于简单了。其内涵之丰富和地域差异之复杂，是局外人所意想不到的。通过十余年来不断的田野调查，笔者基本上搞清楚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刀耕火种状况，并根据轮作方式和民族的定居性将其分为4种类型。

（一）固定地域无轮作类型

这一类型主要分布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卡场景颇族地区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南部的布朗族地区。

在盈江卡场和勐海南部，分别分布着景颇族和布朗族星罗棋布的村落，每个村落都有明确的地界，村民们附着于村落的土地上，极少迁移流动。两个地区的刀耕火种方式，都是单一无轮作类型。其特点是，每个村落都将自己的林地规划为7、8片或10余片（主要以森林更新所需年限为依据），按照规划的顺序，每年砍种一大片或几小片，每片地仅种一季作物便抛荒休闲，形成严格的有序轮歇周期，从而达到对林地长期保护利用的目的。

无轮作刀耕火种，具有与之相应的一套生产技术。其生产技术的诀窍，集中体现在“烧而不耕”这四个字上。烧得好，肥料多，土壤疏松，草死虫灭；不使用锄犁耕地，是因为深耕会导致表层灰肥损耗，加剧水土流失，还会损害地里树桩的树根。烧而不耕，生产工具就只需要砍刀和点播棒。生产工序也比较简单，冬春之际砍地，暮春烧地，初夏播种，林地烧得透彻，盛夏不必除草，待庄稼成熟，守地护秋，接着便可收粮入仓。可见，这是一种极为粗放的农业。然而唯其粗放，也就特别省力，因而人们称其为种“懒活地”。时下流行的观点是，粗放必然原始落后。然而山民们却并不同意这种看法，能否有效地保护林地资源，能否少投入高产出，这才是他们衡量先进与落后的尺度。

卡场景颇族和勐海布郎族过去完全依赖单一的无轮作刀耕火种为生，目前虽然开垦了不少水田，然而总的来看刀耕火种仍然居于主导地位。究其原因，是由于两区的人地比例关系基本上还能承受这种农业的缘故。

（二）固定地域混合轮歇类型

固定地域混合轮歇类型分布较广，德宏州的傈僳族，部分景颇族、德昂族及汉族地区，临沧专区西南部的沧源佤族地区，思茅专区西南部的佤族和拉祜族地区，西双版纳州的基诺族和部分哈尼族地区，是其主要分布地。

属于这一类型的众多的民族，同样是在固定的村落土地范围内定居生活，然而他们并不单纯地依赖一种刀耕火种轮歇制，而是同时交替从事几种轮歇制。即除了耕种“懒活地”之外，还进行多年轮作刀耕火种。轮作刀耕火种又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短期轮作休闲制——连续轮作耕种2至3年，休闲7、8年10余年；其二是长期轮作休闲制——连续轮作耕种5、6年甚至7、8年，休闲10余年或20、30年。从事轮作的地区，一年之中必须同时进行双轨制的生产安排，即从冬春之际开始的懒活地耕种和始于夏末秋初的轮作地耕种。

轮作制的产生，必须具备3个条件。第一是土地分类知识。凡从事轮作的山地民族，都具备丰富的土地分类知识，他们一般按林地海拔高低和土壤肥瘠将其划分为2至3类，并施以相应的轮作制度。第二是耕作技术的进步。3年以上的轮作，必须逐年深耕土地增加熟土，仅靠砍刀和点播棒的不锄不犁的懒活地耕种方式显然不能适应，于是铁锄和牛犁的使用就是不可缺少的了。而随着锄犁的使用，播种技术也发生了变化，效率较高的撒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第三，必须具备丰富的栽培作物利用知识。山地旱田能否实现长期耕种，关键是如何解决后续肥料的投入。亚热带山地土壤贫瘠，水土流失严重，仅靠头年砍焚森林的投入并不能维持长期耕种。在山高坡陡，地远路遥的耕种条件下，人们很难选择平原积肥施肥的方法，而是走出了利用栽培作物调节、更新地力的途径。常见的如使用苏子、芝麻、棉花黄豆等肥地作物和陆稻、玉米等轮

流栽种，以延长土地的耕种年限。对于主要栽培作物陆稻，则千方百计地驯化和引进了具有不同生态特性的丰富品种，根据林地逐年递减的地力，配置以与之相应的陆稻品种，同样能达到长期轮作的目的。在滇西南刀耕火种地带，陆稻品种多达上千个，这是很令人吃惊的。

实行短期轮作休闲制，尤其是实行长期轮作休闲制，与十分粗放的无轮作刀耕火种相比较，已经显示了集约化的倾向。对于山地刀耕火种农业而言，越粗放意味着越省力，越集约则意味着劳力投入越多。众所周知，连续耕种无情消耗山民劳力的“罪魁祸首”是草害。林地耕种时间越长，草害便越严重，长达3个多月的中耕除草，如果稍有松懈，庄稼即严重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因此，一般而言，山地民族并不情愿选择连续耕种生产方式，只是由于人口增多，土地紧张，在不节约耕地便无法满足口粮的情况下，人们才被迫发展多年轮作休闲制，这就是轮作休闲制形成的原因。

（三）固定地域游耕混合轮歇类型

这一类型主要分布在怒江峡谷北段和独龙江河谷地区，居住在那里的独龙族和怒族、从事着多种轮歇方式的刀耕火种农业、轮歇方式的多样化，主要是由地类决定的。在滇西南山地民族之中，独龙族的土地分类最为复杂，总的来看，独龙族将其生境的林地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叫作“香木朗”，意为“刀砍地”。香木朗根据植被类型，又分为三个亚类：森林香木朗、竹林香木朗和竹木混交林香木朗。森林香木朗和竹林香木朗按森林状况和竹子种类再各自分成三个次亚类，前者为“目林木”，“样伯（或“样沙”）”、“样奇”，后者为“日久垮”、“久垮”、“格芦”。香木朗按无轮作方式耕种，一般种1年休闲5至7年。生产工具是简单的“戈拉”和“恰卡”。“戈拉”系木质工具，取天然树杈削制而成，在“戈拉”鹤嘴部分包卷铁皮叫“恰卡”，两种工具虽然极其简陋，然而对于耕种陡坡香木朗而言，却是非常安全和方便的工具。独龙族的第二类土地叫“斯蒙木朗”，即人工栽培冬瓜树进行轮作的土地。这类地实行短期轮作休闲制，一般连续耕种2至3年，抛荒休闲3至6年。第三类土地称为“阿白木朗”，是灌木草地，实行短期轮作短期休闲制，一般连续耕种3至4年，休闲1至2年。第四类地名为“结白”或“格鲁”，是房前屋边长年栽种蔬菜的固定园地。除了上述四类旱地之外，解放后南部河谷增加了水田稻作农业。怒江峡谷北部的怒族和傈僳族也把旱地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火山轮歇地，种1年休闲2至10余年；第二类是粮林轮作地，种2至3年休闲4至6年；第三类是锄挖地，种3至8年，休闲4至10余年；第四类是牛犁地，为固定耕地。此外还有水田。

就同时从事多种轮歇制这一点来看，该区与滇南基诺族、佤族等地区应属同一类型，然而从民族定着性来看，便有区别了。基诺族、佤族等是定居刀耕火种民族，而独龙族和怒族等在50年代以前则是游耕民族。不过，独龙族和怒族的游耕，仅仅只是

在村落地域范围内的距离的移动,而非随意性的长途迁移。在独龙江河谷,有两种游耕方式。在河谷北部,人们一般有两处居所,一在江西,一在江东,房屋建筑形式受藏族影响,为以园木磊叠或以木板装围的木楞房。耕种江东之地时,便居住于江东,江西林地休闲期满,又移往江西,约4、5年迁移一次。在河谷南部,独龙人就地而居,迁移频繁,每个居所最多居住2至3年。其房屋是所谓“千脚落地”的干栏式木竹结构草房、取材容易,建造简陋,使用寿命极短,搬走即弃。怒江峡谷北段怒族的游耕形式颇为特殊。该区怒族过去一般有两处住址,一在高山一在江边,一年之中,根据季节变更和农牧业生产的需要,冬入深谷,夏居高山,形成了有规律的季节性垂直游耕游牧生活方式。

固定地域游耕方式作为横断山脉峡谷突出的区域特征,也非“原始残余”,显而易见,那不过是当地民族的一种特殊的适应方式。峡谷山高谷深,江流湍急,山势险峻,行路艰难,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要选择定居往返劳作是相当困难的,而采取人随地走的方式,无疑会大大节省劳力。

(四) 随意游耕类型

滇南中老、中缅边境地带,是随意游耕类型的分布地区。随意游耕民族,主要有瑶族、苗族、部分哈尼族和拉祜族等。

所谓随意游耕,是指不受村界约束的任意选择林地的刀耕火种。随意游耕又可以分为三个亚类型。

(1) 无轮作游耕亚类型

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的部分瑶族、哈尼族、克木人等,他们从事与盈江县卡场景颇族和勐海县布朗族相同的无轮作刀耕火种,然而却并不十分重视村落林地的规划和管理,当生境的自然生态趋于恶化,他们便分出一部分人家或者全寨搬迁,寻求新的乐土。

(2) 牛犁地游耕亚类型

习惯于此类生产方式的民族,主要是勐腊县的部分瑶族和哈尼族。牛犁游耕民对于刀耕火种方式的选择正好与无轮作游耕民相反,他们认为,虽然无轮作比较省力,然而收成不大可靠,牛犁地旱涝保收,比较把稳,因此即使投入较多劳力也在所不惜。牛犁游耕民每迁到一个新的地方,便伐木烧山挖树根,力求在短期内将森林地转变为草地,从而为方便牛犁创造条件。而当地力衰竭之后,便又移往他山。牛犁游耕民选择新址的条件与无轮作游耕民有所不同,后者以追逐森林为目的,前者则尽量挑选较适于牛犁的稍微平缓的茅草岭。

(3) 混合轮歇游耕类型

这是依赖多种轮歇制的游耕类型,瑶族、哈尼族、苗族、拉祜族、克木人中都有

这种类型。他们既种懒活地，也种轮作的牛犁地、锄挖地，而当人口增多，聚落膨胀，耕地紧张的时候，便采取分寨迁徙的方法以解决生存危机。

随意游耕民的定着年限，因民族因地区而异，有的民族2至3年就移动一次，而有的民族10多年才搬迁一回。迁徙范围也有很大不同，有的长期在方圆几十里范围内打转，而有的一次搬迁就远达几十里。

游耕民的迁徙，有社会文化等复杂的因素，然而根本原因却是人与生产资源的矛盾。对于这一矛盾，定居刀耕火种民主要是通过健全社会组织、严格生产管理和提高生产技术的途径以求缓解，而游耕民则采取比较简单干脆的迁徙方式求得摆脱。然而在游耕民中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傣族脱贫脱贫，我们搬家搬穷。”可见，迁徙虽然会带来新生，却也要付出昂贵的代价。

三 演变趋势

解放四十年来，由于人口、政治运动、政策、科学技术等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云南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衰落的景象。目前，变化过程还在进一步发展，各个区域既表现出共同的危机趋势，又具有不同的变化特征。

在实行无轮作刀耕火种的地区，50年代以来的明显的困难，是许多村落固有林地的减少和抛荒休闲年限的缩短。林地减少，既有绝对减少也有相对减少。所谓绝对减少，是由于解放后自然保护区和国有林的规划，致使山地民族固有林地面积的减少；所谓相对减少，是指人口增长造成的人均占有林地数量的下降。耕地面积减少，势必要缩短轮歇周期，以往严格遵循的林地休闲期不满7年以上不能砍种的规矩，在生存压力之下不得不放弃。例如卡场地区，5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村落的轮歇周期都在10年以上，而到了80年代，还能沿袭10年以上轮歇的村落已寥寥无几。据当地政府1982年对25个村落的统计，轮歇周期为12年的村落仅有一个，11年的1个，10年的6个，9年的3个，8年的6个，7年的2个，5年的2个，4年的3个，3年的1个。轮歇周期降到7年以下的村落，其土地抛荒之后不能足够休闲，地力难以更新，植被退化为稀树草地，投入不足，产出锐减，农业生态系统不可避免地陷于恶性循环的状态之中。

和无轮作地区相比较，混合轮歇地区的自然生态和农业生态的恶化更为严重。目前，由于森林的锐减，这类地区懒活地的耕种面积已经很少，而轮作轮歇耕种的情况也趋恶化。首先，由于商品市场的发展，山地民族十分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有所改变，于是一些曾经是传统生活中不可缺少并且具有更新地力的显著作用的栽培作物被自然淘汰了，其结果是多种类作物轮作制的消失。其次，按照传统经验，轮作地的休闲年限应比懒活地更长，而且轮作年限越长休闲年限也应随之增加，然而目前大部分地区的轮作地一般都只能休闲3至5年。休闲不足，掠夺式的耕种，已使滇西南数百万亩山地沦为荒山草坡。对于山地农业而言，最常见最难以摆脱的困扰莫过于草害了，而当森

林被茅草取代之后, 草害的泛滥也就变得更加难以对付。在滇西南山地, 近年来的‘草害之最’大概要推紫茎泽兰(*Eupatorium coelesticum* linn)了, 这是一种繁殖迅速、无孔不入、生命力极强的恶性害草。到过滇西南山地的人, 只要稍加注意, 都会对这种草害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西盟阿佤山一带, 绝大部分轮歇地上都长满了一人多高、密不透风的紫茎泽兰, 森林为之排挤, 牛马食之中毒, 砍芟之后晒不死、烧不烂、危害十分严重。由于以上原因, 该区建立在森林和丰富作物基础上的长期轮作制已不复存在。在目前普遍实行的短期轮作短期休闲的恶性循环中, 为了避免农业生态系统的崩溃, 人们不得不日益严重地依赖化肥和农药。化肥和农药的使用, 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看, 无疑是一个进步, 然而当它给山地农业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 也将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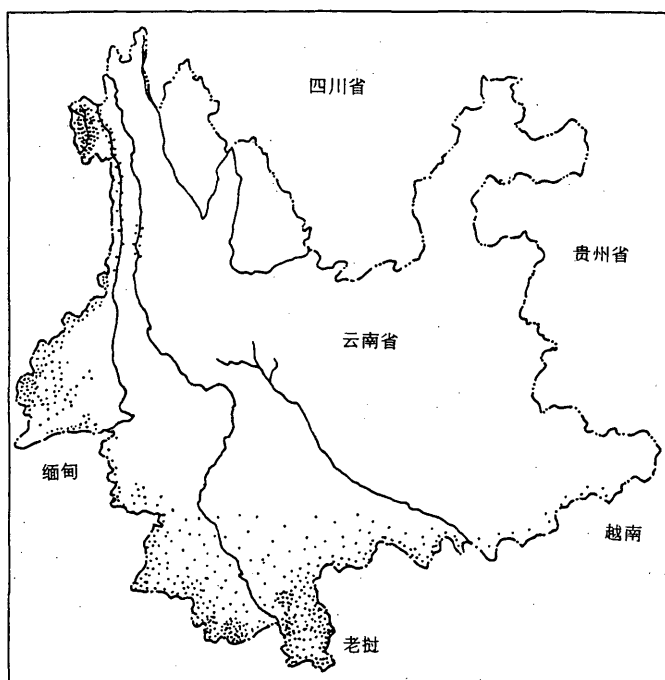
在固定地域游耕地区, 人们已从游耕转向定居。由于村落土地范围的缩小, 加之交通状况一定程度的改善, 独龙族入随地走以及怒族垂直移动的生活方式都已成为历史。受北部藏族生产方式的影响, 怒族靠发展水田和使用农家肥固定耕地已经取得显著成效, 刀耕火种日益减少, 在不少村落甚至已经绝迹了。独龙族受着地理环境的严重制约, 依赖刀耕火种为生的生产方式没有太大的改变。值得庆幸的是, 独龙人并没有放弃栽种水冬瓜树进行粮林轮作的优良传统, 所以尽管那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生境恶化的问题, 然而如果充分发挥人工调节的功能, 前景未必十分暗淡。

进入80年代, 滇南游耕民的生活方式改变得尤为彻底, 过去以四海为家的游耕民大都定居下来了。其原因主要是1982年国家发布新的森林土地法之后, 国有森林、集体所有森林、各村落所有森林, 各家各户使用的林地都已分划界定了的缘故。这样一来, 如果再进行迁移, 就意味着将失去属于自己使用的林地, 而且无论走到什么地方, 都将受到当地森林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拒绝和反对。生活方式的改变是长期和痛苦的, 尤其是当定居地生境恶化之后, 有的村落仍然甘冒各种风险而远走他乡, 这样的事例还时有发生。在中老边境一带, 不断有老挝流民进入我国山地游耕, 这类情况颇使当地政府棘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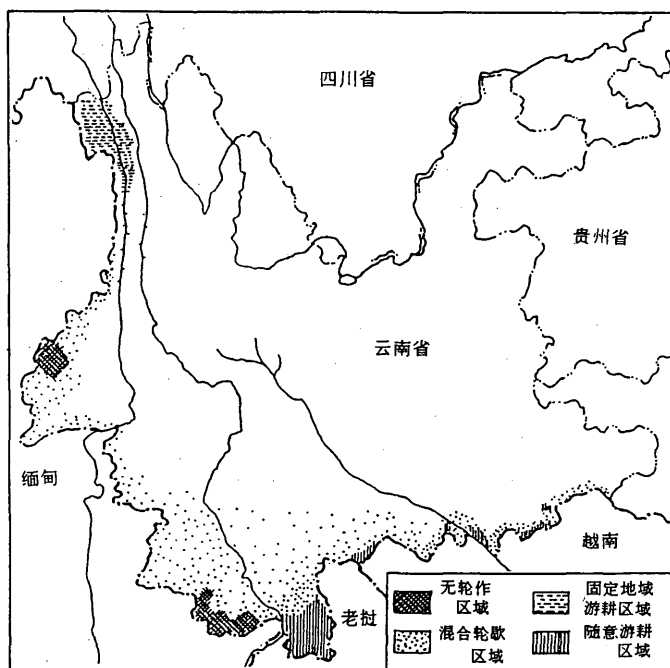
滇西南的山地民族, 目前正处于传统农业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日益恶化的过程中。如果从人口继续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这一点来看, 前景很难说是光明的。不过, 作为发展的对策, 已经有过若干尝试和努力, 例如开垦水田、山民向低地迁移、固定耕地、‘两化上山’(即向山区推广使用化肥和农药)、种植经济作物、开采矿业等。从道理上说, 发展水田应是取代刀耕火种的较佳途径。解放四十年来, 山势平缓、水源充足的地区已实现了向水田农业的转化, 然而有不少受自然条件限制的地方, 水田农业目前不可能, 今后也不可能完全取代旱地农业。水田农业的实现, 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劳力投入, 其发展道路肯定是比较艰难和缓慢的。为了减少刀耕火种而移民下坝的实线, 50年代便开始推行了。其时坝区人口不多, 尚能容纳部分移民, 目前坝

区人地关系已十分紧张，继续移民困难重重。固定耕地和“两化上山”，是一条科学技术改革的道路。固定耕地的最大障碍，是草害问题。“两化上山”有利也有弊，在推广使用“两化”的同时，如何防止人们对它们的过分依赖，如何避免毒化生态环境，是今后不可不注意的课题。进入80年代之后，有的山区因种植茶叶、砂仁、橡胶、水果等经济作物而脱贫，或因开采矿藏而致富。在这类地区，人们争先恐后去从事能获大利的行业，一直居于经济主导地位的刀耕火种农业顿时变得无足轻重了。因此，专家们已不必再过分焦虑如何去禁止他们的刀耕火种，刀耕火种农业的消亡前提是必须产生新的优于刀耕火种的生存方式，并且能被山地民族所接受。

云南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农业，经历了兴盛和衰落的发展阶段之后，不可避免地将走向消亡。然而，这一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不能归功于那些对刀耕火种不甚了解的偏激的自然保护主义者的严厉指责，归根到底，它是由人口与资源相互作用的规律支配的。不过，这并非说人类对于刀耕火种演变过程完全无能为力，只是应该特别强调，在社会文化、科学技术以及自然条件都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要改变一个民族的经济形态——适应方式将是极其困难的。而在没有新的有效的能为山民接受的取代方式产生之前，尤其不可盲目地干预和破坏他们旧有的生产方式，无数事实说明，这样做只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多民族的国家，发展差异总是存在的，这是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当一些边远山区离开了刀耕火种农业便无以为生的时候，当一些地区还有条件利用有序轮歇、轮作、粮林轮作实现较佳经济和生态效益的时候，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绝不应该是如何立即消灭这种农业。而对于研究者来说，如果我们真正为山地民族着想的话，也许不应该仅仅停留于一般的议论上，最好是去进行扎实深入的研究，从而找出优于现状的发展途径。



云南刀耕火种分布示意图



云南刀耕火种区域差异示意图

